

党在我心中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颜景政

封面设计：罗雪村

党在我心中

苗作斌 徐安德 荀春荣 编著
马捷莎 周 薇 王炳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4.5 字数92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00 定价2.10元

ISBN 7-80002-330-3/D·46

前 言

青春，是人生最为宝贵的一个阶段。它是茁壮的生命力，它交织着希望与奋斗，它更预示着未来。

未来会是什么样？人们对此回答各式各样，甚至迥然不同。但是，未来属于青年，这却是无可争议的。

当代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成学业于本世纪，成事业于新纪元。生逢此时，当然荣幸，却也艰难。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这是需要当代青年用全身心来作答的。

挑战与机遇并存。迎接挑战，青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展望未来，青年昂首阔步，充满信心。因为，历史的经验，时代的要求，未来的召唤，都告诉我们的青年要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凝聚在“三热爱”之中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

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并非易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的前夜，我们真诚地把《祖国在我心中》《社会主义在我心中》《党在我心中》这三本书奉献给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奉献给为社会主义祖国建功立业的青年。愿有志青年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面发展，青春永驻。

为了编写这三本书，组织了以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为首的编委会，有周之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党委书记）、王礼明（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俞家庆（中国教育报总编辑）、崔

奇(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刘永曾(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苗作斌(《求是》杂志编审)、贺允清(北京师范大学中学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司锡龄(中宣部教育局普教处处长)、李意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颜景政(人民日报出版社主任编辑)。编委会邀请首都教育界、理论界的一些教授、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座谈和撰写。在撰写过程中,力求做到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文笔生动活泼。但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所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缺点,敬请广大青年朋友批评指正。

编委会

1991年6月

目 录

阴霾里一声春雷·····	(1)
时代潮流的产儿·····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4)
从三百到一个, 从五十七到五千万·····	(7)
翻转旧世界的杠杆·····	(11)
除了组织, 没有别的武器·····	(11)
先锋队·····	(16)
观察国家命运的新工具·····	(19)
严格、严密·····	(21)
最壮丽、最引人、最艰巨的事业·····	(24)
旗帜·火炬·核心力量·····	(27)
亿万人民的粘合剂和凝聚核·····	(27)
真正的优势所在·····	(30)
百炼成钢·····	(33)
领导与合作·····	(37)
开天辟地的新事业·····	(41)
推翻三座大山·····	(41)
开辟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	(44)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48)
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	(52)

桥梁·纽带·堡垒·····	(55)
有机整体中的基础·····	(55)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桥头堡·····	(57)
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火车头·····	(61)
钢铁长城的基石·····	(64)
灿烂的群星·····	(67)
特殊材料和精华荟萃·····	(67)
为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74)
是领袖又是学生·····	(7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3)
在坚持正义、热爱真理的人眼里·····	(85)
永远保持朝气蓬勃·····	(89)
箭与靶·····	(89)
安泰与大地·····	(94)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98)
吐故纳新·····	(103)
前进在曲折的道路上·····	(107)
艰难曲折 勇往直前·····	(107)
警钟长鸣 卓有成效·····	(112)
经受考验 拒腐防变·····	(117)
曲折性与必然性·····	(119)
党与青年·····	(124)
历史的昭示·····	(124)
在党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129)
期望与未来·····	(133)

阴霾里一声春雷

七十年前，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国大地。多少年来的反动统治开始土崩瓦解，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凭空而来的吗？不是。它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时代潮流的产儿

1921年的初夏，上海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们，以其特有的嗅觉在搜寻着什么。他们突然闯入法租界渔阳里六号，发现十几个人在开会。巡捕问：“开什么会？”参加会的李汉俊答：“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在谈论编写现代丛书的问题。”巡捕们搜查后一无所获。会议很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几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时代潮流的产儿。她的产生，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共产

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在中国，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1894年，中国已有近10万产业工人。1919年，已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主要从事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一年内全国性罢工达30次，1919年上半年就达19次。随着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真理。

“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李大钊、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李大钊任编辑主任的《少年中国》，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出版的《觉悟》。此外，还有《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星期日》、《教育潮》等。在湖北，恽代英组织了利群书社；在广东，阮啸仙组织了新学生社。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半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之后，他又在《新青年》及其它刊物上发表了《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初步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问题和思想史问题。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也在《新青年》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新青年》杂志在这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即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文、关于苏联的研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通讯等共137篇。与此同时，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如《新青年》杂志社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版了八本新丛书。1920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译成中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需要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两者结合的时机成熟了。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9月，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以及在日本、巴黎等地的留学生，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启江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等地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了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和工读互助团。湖北小组于1921年3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济南小组、广州小组也在工人中广泛开展工作。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华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工人运动更加发展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发生罢工46次，罢工人数在5万人左右。1921年罢工49次，罢工人数达13万。这些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众里寻他千百度

鸦片战争以来，国运衰败、民族受辱，中华民族中的许多先进分子面对这种危难局面，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抗英英雄林则徐不仅奋起禁烟，顽强地同外国侵略者斗争，而且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这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行不通的。不久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提出了《天朝田亩制》的设想。他的族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一些西方的情况，主张发展工业，开采矿藏，创办交通，发行纸币，设立银行、邮局、报馆、医院，主张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与外国通商。但是，他们终因不能克服农民运动自身的弱点而失败了。后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开始认识到这同他们实行的制度有关。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名学》、《法意》等书，传播欧洲资产阶级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甲午战争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日趋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

为代表的维新派终于在1898年发动了一场有理论、有纲领的救亡爱国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他们在经济上提出以商建国，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主张“申民权”、“设议院”，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搞君主立宪的改良。这是一个“政治西化”的方案。然而，这个“政治西化”的最初尝试，很快被扼杀在血泊之中。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武昌起义后，他主持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并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原则和责任内阁的政体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孙中山先生向西方学习的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也破产了。

从林则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到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以八十多年的经历、流血牺牲的教训，告诉中国人民一个真理：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了上述艰难困苦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决心要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一生。但是，究竟选择一条怎样奋斗的道路？他感到困惑。1907年，18岁的李大钊“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以兴奋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书籍，“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他兴奋、欢呼，希望中国也

能成为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年，李大钊在北京加入社会党，后任天津社会党支部干事。然而，他并未见到一丝光明。1914年初，李大钊含愤东渡日本，以期在异国求得救国真理，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工作之际，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他以不断探索真理的顽强精神，搜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经过几个月的比较研究，终于探明十月革命的真谛。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也是我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的起步标志。经过了十几年的艰难探索，经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李大钊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富强之路，并积极为之奋斗终生。

毛泽东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决心以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可是救国之路在哪里呢？他同样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探索。辛亥革命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参加了新军。但当他看到革命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官僚手中后，对这次革命完全失望了。他退出新军，继续读书，从中寻求中国的出路。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然而，这并没有使他找到拯救国家的正确道路。1919年12月他再次来北京，通过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这之后，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察国家命运的新武器，他看到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深情地对美国记

者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路上。”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熏陶，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读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并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为题作文。1918年，周恩来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1919年，他回国参加五四运动的实践，进一步动摇并逐渐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1920年1月，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被拘入狱。半年羁押期间，经过对社会思潮的反思和现实斗争的审视，他开始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来在旅欧期间，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实地考察欧洲社会，慎重研究比较各种主义，最终确定以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并表示要坚决地为共产主义而宣传奔走。

为了寻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道，我们的先辈进行了多少寻寻觅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经受了多少艰辛和曲折。最终才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奏起了新生的乐章。

从三百到一个，从五十七到五千万

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产生过300多个政党、团体。1905年孙中山领导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政

党。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组建了国民宪政会（后改为帝国统一党），梁启超组建了政闻社，还出现了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宪友社、帝国宪政促进会、辛亥俱乐部等。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政党林立的时代。仅在1912年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有：中华民国工党、统一党、民社、共和实进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民国公会等。其间，袁世凯为了复辟寡权的政治需要，也组织了一批御用政党，如共和党、进步党、公民党等。此外，由清朝皇族宗室亲贵组成了以反对清帝退位为目标的宗社党。还有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政党仍继续发展，又建立过几十个。

所有的政党，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但是，一个党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关键是取决于人民对它们的选择。以保皇为主要目标的宗社党，成立不足一年就宣告解体；袁世凯的御用政党，也随着袁氏皇帝梦的破灭而退出了历史舞台；鼓吹君主立宪的党派团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多自行瓦解；随着“议会政治”幻想的破灭，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在热闹了一阵之后，也偃旗息鼓。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经过多次改组，演变成了国民党。由于孙中山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一再破产，使他在绝望中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1924年1月改组了国民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这时的国民党，成为各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党。它一度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

张，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使国民党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国民党在中国的22年的统治中，进一步把中国引向黑暗，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国民党最终遭到了人民的唾弃。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三百多个政党团体，或由于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由于其软弱性、妥协性，终于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了，淘汰了。而中国共产党以其英勇奋斗的事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定和拥护。

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聚集在浙江嘉兴南湖那艘游艇上时，他们代表的党员不过57人。之后，就遭到敌人残酷的围剿和屠杀。1927年4月，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南方，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如向警予、郭亮、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熊雄、恽代英、彭湃、罗登贤等，惨遭杀害。已经发展到5.7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只剩下1.3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批又一批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担任北伐军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于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革命军团长的彭德怀，于192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也在国民党叛变后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尽管当时处于革命低潮，到193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发展到30万人。以后，由于党内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党的力量

再次遭受惨重损失。长征胜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又减少到4万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牺牲了数十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但是，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源源不断地奔赴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21万人，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党。在解放战争中，为了建立新中国，又有数十万优秀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舍身炸雕堡的董存瑞、宁死不屈的王孝和、在铡刀下英勇就义的刘胡兰以及在中美合作所战斗到最后一刻遇难的同志，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又纷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到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已发展到450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切愿意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爱国志士的政治夙愿。大批新鲜血液输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中国共产党由七十年前仅有57人的一个小党，至今成为拥有5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懂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衷心地拥护她，爱戴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翻转旧世界的杠杆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

不少青年人可能知道，这是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关于杠杆原理的一句名言。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青年们未必都知道，这是革命导师列宁借用阿基米德名言，对革命组织的极端重要性所做的高度概括。

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革命家组织，就是翻转旧世界的杠杆——共产党。

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有组织的群体，其蕴含的能量远大于无组织或组织不佳的群体。就像民谚所云：丝线也能捆住雄狮，只要拧成一股绳。

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诚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

工人阶级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它们掌握着国家机器、军队警察、舆论宣传工具……可以想象，在强大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无组织的、分散的、自发的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拧成一股